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衙斋杂录》 与姚莹的《康輶纪行》

焦 静 宜

清中叶以降，边防松弛，外患日逼，因而“海防”与“塞防”之议成为朝廷内外关注的问题，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渐致力于边疆问题的研求。梁启超曾对这一学术思潮作过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尤提及徐松、张穆、何秋涛为最名家，并把这门新兴学术概括进“清学”中去；但与此同时，他又慨叹地理学的不重现状，说：“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活学变为死学，惟据全祖望著《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无继也。”^①这一说法似乎失于鲁莽，因为直至鸦片战争后，仍有人以海防失守的沉痛教训而注意并研究边疆地区的疆域及防守问题，并以实地考察的记录，为边疆文献作出了贡献。林则徐和姚莹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二人都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抵抗派人物，又都因保疆守土而触怒侵略者和朝廷内保守势力以致遭到贬谪。他们虽身处逆境，但初衷不改，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关心国家的存亡命运。林则徐在赴戍期间撰写了《荷戈纪程》，在戍所又编辑了《衙斋杂录》；姚莹则在谪官四川后奉使入藏期间撰著了《康輶纪行》。这些著述对原有的西北、西南边疆文献进行了考订、研究，成为

对祖国边陲防守与建设的文献依据，并以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而具特色。因此，他们的这些著述不能视之为旅途随录，而是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经世著述。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在两广总督任上被道光帝革职，中经河工效力“无效”，仍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继续上路西戍。从七月初六日由西安出发，至同年十一月到达伊犁戍所。此后居疆三年，终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一月初六日获悉释回起用的圣旨。其间，他目睹西北边疆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状况，而坚定了海塞兼重的国防思想。他在由西安至伊犁赴戍的艰辛跋涉中，留意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并作了实地记录，直至到达戍所止，每日备记行程，写成了《荷戈纪程》。在伊犁戍所的萧索生活中，为及时了解政情及探索开发新疆的办法，他又以摘抄官方邸报和地方档案的方式，辑成《衙斋杂录》。

《荷戈纪程》如实地反映了林则徐关于塞防思想愈益成熟的过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该书侧重记载的内容显示了它对这一时期边疆文献的特殊价值。《荷戈纪程》主要有如下特色：

（1）详记并考订地理位置、区域界划及关隘险要。林则徐每日均记行至何处，与周边邻地的距离，方位意识极强，重要处还附了不同行走路线。如记哈密城“距嘉峪关一万五千余里。……新疆南北两路，皆此分途，天山横亘其中，故有南北祁连之称。祁连即天山，夷语谓之达班。北路过达班则至巴里坤，即镇西府城，附郭为宜禾县，凡赴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伊犁者，皆应取道于北。其西南达吐鲁番，凡赴南之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者，皆应取道于南。”^②林则徐对险关要隘十分重视，所过之处，书中皆有记录。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林则徐由兰州启

程，过黄河浮桥时有记：“过黄河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復有集吉草巨纆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③。”如对嘉峪关的记载，称：“城楼三座，皆三层，巍然拱峙，关内设有号房，登记出入人数。一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皆然。近关多土坡，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外皆蒙古及番地耳。”^④另外，对一些重要关镇的边界沿革还作了考证，如张掖一带的界墙曾引起林则徐的注意，记曰：“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闻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画界，墙以外六十里仍为汉民游牧之所，六十里外乃蒙古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⑤林则徐的地理观念多与周边环境相联系，其中的边患意识说明他颇具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2) 林则徐较注意民族矛盾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逐日记载所过之地的景物中就记及康熙间名将孙思克将军、王将军及张将军(不知何年)等在此处“戡定羌夷”的纪念碑。^⑥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林则徐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祁鹤皋撰《万里行程记》对嘉峪关外重镇玉门的归属沿革进行了考证，认为：“明永乐二年，有蒙古塔里尼率部内附，遂建赤金蒙古所。正、嘉以后为吐鲁番所据，国初定鼎后内附。康熙五十七年置靖逆同知。雍正三年以柳沟通判调靖逆厅，领靖逆卫赤金所。乾隆七年改赤金所为卫。二十四年西域拓疆，遂将靖、赤两卫并为一县，赐名玉门县。”^⑦《荷戈纪程》还记录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实况，其中既有哈密附近回城、土城等地回汉安然相处的情况，也有民族矛盾尖锐的情状：如“闻数日前，距此十余里，有黑番来抢牲畜，戕一守备；今年西宁甘凉一带边境似此者屡矣”。并分析其原因为：“自兰州至肃州内地所辖者，东西长而南北短。其北为蒙古，尚属安静；南则熟番、生番，节节多故，其所由来者

渐耳。”^⑧调协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是巩固塞防的关键之一，林则徐未能在此时此处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当有其谪官身份的难言之隐，但从记载中仍可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和重视。

(3) 边塞的守备和驻防情况也是《荷戈纪程》所记的主要内容之一。林则徐尤其对在地处偏远而又居新疆腹地的要道上所见的驻防情况备加注意。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下旬过哈密开始，书中就有十余处分别记哈密城、古城、阜康、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及广仁城等处治所及驻防情况。^⑨

(4) 关心民生疾苦是林则徐的一贯作风，《荷戈纪程》在记行程的同时，还记所过之地的生态环境，而记生态环境又必与民生情况紧密相连。如泾河“水势浩瀚”，“其二十里间枣树最多，其实已纂纂矣，桑树亦葱葱，弥望诚一幅豳风图也”^⑩。由陕入甘，“沿途皆极荒陋”，使其心情沉重；入高台境，“田土腴润”，“林木葱蔚”，又使其心怡。^⑪至新疆后，沿途多为戈壁，荒无人烟，然每遇人口集聚、物产丰盛之处，他又必然了解当地生产与水利的关系，如记木垒河“商贾云集，田亩甚多，民户约五百家”，遂记“有河一道，洩雪山之水”^⑫；而奎墩则“居民亦有百余户，闻水利薄，田不腴，村墟殊荒陋耳”^⑬。说明他在入疆之始便已经注意到了治水是开发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

《衙斋杂录》虽然是由林则徐摘抄官方邸报和地方档案而成，但也能从其所收集的资料内容推知林则徐所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些资料经过岁月的淘洗，亦可称弥足珍贵。《杂录》中除录入京报中有关东南沿海的资料及部分官员异动的消息外，主要抄录了清代经营新疆的资料，而以屯田档案为主，尤以道光时期为详。如《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阿克苏大臣辑》、《正月初五日，谦帅寄邓信论南路开垦事》、《哈密厅卷宗》、《摘录王公表传，哈密回

部总传》、《嘉峪》、《哈密总传》、《额贝都拉传》^④等。这些资料在当时是林则徐主要为供自己在勘荒工作中参考，但他追溯了新疆屯田的由始，了解了统治当局的屯田政策，并对垦荒工作的关键问题——“招种”一环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原案摘略》即录入了道光年间开垦招集的人数、实际“认种”的人数、开垦土地总数、每亩科则初定数及后来增征数等重要数据。同时，他还认真研究了新疆垦田的经验教训。

姚莹在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时会同总兵达洪阿率军奋力抵抗侵台英军取得胜利，但却被清廷以“冒功饰奏”的罪名始而羁狱，继而贬谪四川，以同知知州补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当姚莹抵达成都时适逢西藏乍雅发生正副呼图克图宗教纠纷，即被派往解决。乍雅位于打箭炉西北，为宁静山外前藏所辖之部落，距四川布政司三千余里，旧为黄教正副两呼图克图所据。“呼图克图者，大蕃僧历转世间不迷本性之称呼”^⑤，明季创设寺院，清康熙年间得封赐印。道光十五年（1835），正副两呼图克图师徒失和，遂以征缴钱粮为由发生纠纷，并进而演为部落争斗，致使西陲不宁。清廷曾多次派员查办，皆难奏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又“上谕四川遴员复往，务须折服其心”。当时姚莹面临着“两呼图克图势不并存，汉蕃委员数往不能平释，驻藏大臣出入敢肆侮困而莫如何”^⑥的局面，他一方面敏锐地感到西藏边陲不靖的危害；另一方面，亦愿“就藏人访西事”，故对此重任“欣然奉使”。在艰难的行进中，他备尝旅途的辛劳，但他仍对“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⑦，两呼图克图的宗教纠纷经调解暂告平息，姚莹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启程回任，后将所记内容撰成《康轺纪行》一书。对重要地区，他还专作《前藏三十一城考》、《察木多西诸部考》及《乍丫图说》，并上乍雅地形势及左贡入藏二道图，“以备异日之用”^⑧。《康轺纪行》

所记时间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至次年十二月，在此期间，英、美、法等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相次成为事实，东南海疆国门大开，西部边疆迭受觊觎，姚莹“喋血饮恨而为此书”^⑩的用心和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1）姚莹对地界、辖属划分作了十分清晰的记载。记里塘称“里塘土司辖地数百里，正南百数十里为瓦述茂丫土司，又数十里即云南中甸界，又二百余里即丽江府治矣”^⑪。记川藏分界，如过宁静山“见雍正五年所立碑界，山以东为川辖，山以西为藏辖，碑裁二尺，字已漫灭，巴塘有巡兵数名于此”^⑫。记乍雅、察木多交界处，如“自巴贡西北行，登大山即巴贡山也。河北石山接连四十里，石峰峻削，高山林立，色赭如火焰，故土名火焰山，略下蝉连相接，为苦弄山，乃乍雅、察木多交界处也”^⑬。等等。除记方位外，姚莹还记录了准确距离，如书中详记了察木多西去尖宿二十八站的站名，并注明总距离为一千五百里；拉里而西尖宿十六站前藏的站名，共一千一十里。对于关隘要道，姚莹在书中屡有所注，如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至中渡河，便记有“河中设浮桥守以外，委汛兵稽往来者，非有官票不能渡，亦蜀藏之咽喉控扼之要津也”^⑭。二十三日过大雪山，不仅遥望雪山“凌霄插汉”，“一望无际”，而且过雪山时亲尝因“积雪甚厚”而“滑险异常，人马数蹶”的道路艰难情况，其核查《通志》而记之：“昂喇山上下约八十里，进藏要道。”^⑮通过实地考察，姚莹还纠正了一些记载的不确之处。如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八过空子顶一带，见该地“山路颇宽……地亦坦旷，河流清浅，绿草黄花，如铺如衬……沿途杨树相望，景物暄丽”，遂批驳《图识》所言“空子顶山峻夹坝，出没莽里，龙新山多积雪”，而得出正确结论是：“余所见殊不而惟山外数峰残雪而已”^⑯。前藏地居西陲，毗邻英法殖民者所领属的印、缅等国，姚莹详记并考辨山川形势及道路险要，其苦心孤诣显而易见。

(2) 姚莹在考察地理的同时，很注意各地方的管理及吏治情况。如启程后三日即至邛州，见“城郭壮丽，廛市极繁”，而发“观今民之殷富，并想汉代卓王孙”之慨叹，因特往见该州官员，表示崇敬。^{②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晚宿清溪县，晤署令汪君徕溪，知其任官“颇强毅”，而赞为“小吏中之矫矫者也”^{②⑦}。至重镇巴塘，对吏治情况更有详细记载，说明该地除官方所派都司、粮台文武二员外，尚有“土官正副宣抚司二员，正土官以年班入京未回，大头人护理土司，副土司索诺木袞布能汉言识汉字”，^{②⑧}意以说明少数民族与朝廷的关系。同时，《康轺纪行》还记录了察木多等地的驻员情况，如“察木多驻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把总各一，统领江卡；乍雅、察木多、硕板多、十三汛粮务知县一员，形势可谓重矣”^{②⑨}。值得注意的是《康轺纪行》中记载了鸦片泛滥及因治理不善而致民乱的情况，由于“建昌一带所产烟泥盛行，奸贩如云，号为‘泥客’，官虑兵役之不胜捕也，则大张晓谕：泥客本犯法民，能逐捕者听。于是所在游民蜂起截劫泥客以为利，自称‘棒客’……既而内地烟泥不甚行，泥客稍衰，而棒客反日众，既无所得泥，则害及行旅，以搜泥为名，无所不至，于是客之名遂变而为匪”，由此而深虑此亦“蜀中之大患也”^{③⑩}。清代中后期吏风日下，已成颓败之势，姚莹以上所记旨在为清廷对边防的治理提供了依据。

(3) 象政治家林则徐一样，姚莹很注意民生民瘼。见“数十里者此稍平旷，可种青稞，碉楼蛮寨相望”之处，则喜其“俨然有富庶之象”^{③⑪}；而“偶见民居村店，屋皆覆板，无复以瓦”，顿生“可知其艰”^{③⑫}的同情之心。看到古树一带“川原平沃，开垦可得田万顷，足养数万人”，但当地“蕃户人稀，所垦仅足终岁之食而已”，从而联想到“内地生齿日繁，地不加辟，观此能无不均之叹”^{③⑬}！由此而注意当地开发土特产的情况，《康轺纪行》中有巴塘产木耳、产米酒及折多、里塘产硫磺等记载，但又深叹

边民颇欠经营意识，木耳每斤仅值银一钱五分^{③④}，而其他则无所开发。

(4) 关心宗教及民族关系，记述少数民族风情，是《康轺纪行》的重要内容。姚莹在入藏途中及至乍雅后，与各地宗教界及少数民族首领进行了广泛接触。由于他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尊重，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在里塘，适逢“浴佛节”，书中详记其盛况。他发现当地宗教虽属佛教，但与内地有所不同：“蕃人礼佛者不持香，手执牛角，遥望见寺，每行一步，画地膜拜，遍绕其寺，而后入门顶礼”；喇嘛颂经“皆在喉间，并无音节，亦无钟磬，惟钲鼓喧振，杂以铃钹”^{③⑤}。生动的记述使人读之如临其境。在察木多，他目睹了大诏寺数百名喇嘛参加跳神的场面，认为“此即藏中刺麻为蕃戏以悦神人之意”^{③⑥}。对西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姚莹以一个久居内地的汉人官吏的新奇眼光作了记述，如衣饰、饮食、劳作等习惯外，还有诸如关外“日用市买皆以物交易，无用制钱者”；街市上“男妇杂沓无忌”^{③⑦}等。对“西蕃兄弟共娶一妇”的习俗，经询及土人，得知“蕃俗重女，治生贸易，皆妇主政，与西洋同。计人户以妇为主，蕃人役重，故兄弟数人共妇，以避徭役，后遂成俗”的缘故，甚叹“可哀”。另外，书中还有关于汉蕃通婚的记载：“汉民娶蕃妇家于其地者，亦多从其俗，男犹汉服，女则俨然蕃妇矣”^{③⑧}。反映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风貌。

林则徐和姚莹同年出生，而姚晚逝二年，完全生活在一个时代。他们同是爱国者，又同在遭受贬谪的情况下撰著文字，对边疆文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往日思想主张的延续。其根本原因，在他们都基于共同的爱国之心。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六日，林则徐自西安出发赴戍伊犁时，他就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③⑨}的决心，

而且在与友人的信中多次表示过“自念祸福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④说明林则徐念念于国事。而姚莹对撰著《康輶纪行》的目的有更明确的说明，他在《复光律原书》中称：“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⑤。一片爱国赤诚跃然纸上。

林则徐、姚莹二人不仅同是爱国者，而且还是相知较深的知音与挚友。道光十四年（1834），林则徐在苏抚任上曾会同江督陶澍推荐当时尚屈居元和县令的姚莹升任高邮知州，林则徐为此出具了切实、具体的考语，称赞姚莹：“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皆有把握”^⑥。这不是浮泛的例行公事，而是林则徐的相知之言，姚莹也因这考语正确评价了自己而把这次受知遇列为生平十大幸事之一。所以时经十余年后，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二月十四日，当姚莹在察木多归途中得知林则徐被放还起用后，喜而成诗一首云：“白发丹心出玉关，清风皓月满天山，五年中外同翘首，一夕乌孙报赐环，明诏应收父老泪，花砖仍冠上卿班，三吴故吏如存问，新探江源雪岭还。”^⑦十年前，一位疆吏了解下僚能悉心讲求“山川形势，民情利弊”；十年后，这位三吴故吏也了解赦还恩主是“新探江源雪岭还”。这表明彼此在注重考察山川形势上确有相通共识之处。正因为他们思想的一致，所以在鸦片战争之际能分别在广东、台湾坚持反抗侵略，也同样得到因功受罚的贬谪命运，而林则徐在译外报中看到沙俄扩张的消息后就意识到这将对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带来威胁，觉察到要注意防俄问题。这一认识不仅使林则徐成为“两防”国防思想的先驱者，也很可能对姚莹有所影响，而埋藏下撰写《康輶纪行》的种子。

林则徐、姚莹的经历遭遇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其一致性，因而在他们贬谪于边疆时便同样都能注意到边疆文献也自有其默

契的可能性，林、姚对边疆文献的记述不仅和清代中期致力于边疆史地的专门学者一样都具有敏锐而远大的眼光，而且他们还曾以保卫海疆对中华民族所建立的重要功绩来书写和丰富了边疆文献的内容。林、姚以其反侵略实践所创造的海疆文献和亲历边陲而记述的陆疆文献都为清代边疆文献的宝库作出了超越一般学者的贡献。这就是林则徐、姚莹在边疆文献领域中应得到的历史地位。

注：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页。
- ② 《荷戈纪程》（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第147页，上海著易堂本（下同，以下简称《丛钞》）。
- ③ 《荷戈纪程》（三），《丛钞》第二帙，第143页。
- ④ 《荷戈纪程》（五），《丛钞》第二帙，第145页。
- ⑤⑥ 《荷戈纪程》（四），《丛钞》第二帙，第144页。
- ⑦ 《荷戈纪程》（六），《丛钞》第二帙，第146页。
- ⑧ 《荷戈纪程》（五），《丛钞》第二帙，第145页。
- ⑨ 《荷戈纪程》（七）、（八）、（九）、（十）、（十一），分别见《丛钞》第二帙，第146、149、150、152页。
- ⑩ 《荷戈纪程》（一），《丛钞》第二帙，第142页。
- ⑪ 《荷戈纪程》（三），《丛钞》第二帙，第143页；《荷戈纪程》（五），《丛钞》第二帙，第145页。
- ⑫ 《荷戈纪程》（八），《丛钞》第二帙，第148页。
- ⑬ 《荷戈纪程》（十），《丛钞》第二帙，第150页。
- ⑭ 见《衙斋杂录》传抄本。
- ⑮ 《康轺纪行》（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第68页，上海著易堂本（下同，以下简称《丛钞》）。
- ⑯ 同上书（三），《丛钞》第三帙，第70页。
- ⑰ 姚浚昌：《姚莹年谱》。
- ⑱⑲⑳ 《康轺纪行》（二十一），《丛钞》第三帙，第88页。
- ㉑ 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8。
- ㉒㉓ 《康轺纪行》（十二），《丛钞》第三帙，第79页。
- ㉔㉕㉖ 同上书（十三），《丛钞》第三帙，第80页。

- ② 同上书(十六),《丛钞》第三帙,第90页。
- ②③ 同上书(十),《丛钞》第三帙,第77页。
- ②④③ 同上书(十五),《丛钞》第三帙,第82页。
- ②⑤ 同上书(一),《丛钞》第三帙。
- ②⑦ 同上书(八),《丛钞》第三帙,第75页。
- ③①③② 同上书(四),《丛钞》第三帙,第71页。
- ③① 同上书(九),《丛钞》第三帙,第76页。
- ③③ 同上书(十四),《丛钞》第三帙,第81页。
- ③⑤ 同上书(十一),《丛钞》第三帙,第78页。
- ③⑦ 同上书(五),《丛钞》第三帙,第72页。
- ③⑨ 《云左山房诗钞》,卷6。
- ④⑩ 《林则徐书简》第196页。
- ④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3。
- ④② 姚莹:《十幸斋记》,《东溟文后集》卷9。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